理论研究

从整体论角度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和战略性。对照战略管理的基本要求可以发现，目前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性研究还是初步的，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刻性还需进一步加强。

□ 曾 峻

整体论视角及其理由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研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把“四个全面”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梦等联系起来，立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认识“四个全面”的贡献，并从哲学上挖掘“四个全面”的方法论意义。坚持把“四个全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有四个方面的理由。

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的有机系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各个学科或单个研究者可以从各自角度把社会系统中的某个方面独立出来加以分析，但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存在的事实不容抹煞。公共管理机构和管理者可以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实施治理，但社会自身的有机性不容忽视。

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执政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发展，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具有整体性，中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全面性。尽管不同时期改革发展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改革发展取向的系统性没有改变。这是改革开放形成的一条基本经验，必须继续坚持。

符合当前及今后的发展取向。经过30多年改革，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不仅意味着要着手破解各种“疑难杂症”“啃硬骨头”，而且意味着要更加自觉地把各项事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通盘考量，加强顶层设计，使改革发展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这正是“四个全面”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指向。

符合战略布局的基本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把“四个全面”定位为“战略布局”，这一定位包含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并重的要求，也包含全面发展和长远发展兼顾的要求。研究“四个全面”必须充分关照战略层面的内涵，把“四个全面”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

整体论研究角度的理论基础

“四个全面”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和战略性，从整体论视角透视“四个全面”也就要运用系统论和战略管理有关理论。

人们通常把系统理解为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按照一定规则组成的有机整体，把战略理解为关于某个系统全局和长远的行动方案。从系统与战略的含义不难看出，两者具有内在关联性。不同之处在于，当把事物作为相对独立的分析单元时，人们更偏重于使用系统概念；当主观意图与具体系统（组织）结合起来并借助特定行为以实现特定目标时，人们更偏重使用战略概念。为方便论述，这里主要以战略管理理论为讨论对象。

20世纪30年代后，国外战略学兴起，经过数十年积累已发展成相对成熟的学科。但在中国，直到现在仍然是理念、原则性东西多于实际运用，实际运用方面也多见于军事和企业组织，执政党和各类公共机构主动运用相对较少。综合已有理论，战略管理特别强调这样一些内容。

重视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组织被视为开放系统，环境被认为充满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组织存亡取决于对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因此，准确判断组织所处方位、加强风险预判与管控是决定组织生死存亡的关键。

重视组织内部各组成部分、各要素和各领域的关联与互动。这种关联和互动不是表面的或依靠外部力量人为促成的，而是基于对组织目标、价值、文化和制度安排的认同而形成的。研究组织内部的关联和互动不能停留于表层，而应找出其中最本质的关系。

重视战略的时间要素。如果说全要素、全局、全面是战略的“空间”要素，那么，组织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则是战略的时间要素。因此要通过历史方位界定，明晰组织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现在处于什么状态，战略方案不仅针对组织当下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而且要通过对当下问题的解决为组织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重视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的统一。没有合理的战略目标，战略措施就会无的放矢；没有有力的战略措施，战略目标就会成为镜花水月。科学的战略应是目标引领措施，措施支撑目标，二者不能偏废。

深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的着力点

对照战略管理的基本要求可以发现，目前对“四个全面”的整体性研究还是初步的，许多议题尚未进入研究视野，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刻性还需进一步加强。

研究“四个全面”时间维度上整体性。把“四个全面”放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这个大背景下来研究，分析“四个全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与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关系，既概括它们之间的连续性或一脉相承一面，又概括“四个全面”的创造性或与时俱进一面。通过纵向比较，更好地反映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国理政建党等方面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布局、新举措和新特点。要研究“四个全面”与“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梦的关系，揭示“四个全面”之于党和国家阶段性发展和长期性发展的双重意义，反映“四个全面”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贡献。

研究“四个全面”横向维度上的整体性。立足“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一命题，分析“四个全面”提出的现实依据、实践基础。进一步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内涵和新要求，进一步研究“四个全面”中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三大战略举措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挖掘“四个全面”在治标与治本、制度与法治、治国与治党、中国与世界、近期与长远等方面体现的深层次贯通，深入挖掘“四个全面”蕴含的精神品质、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

研究推进“四个全面”的实践性课题。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完整的表述，由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三个关键词构成。目前研究最多的是“四个全面”，其次是战略布局，最少的是协调推进。在战略管理上，协调推进就是战略实施中的过程管理问题，必须有相应的体制、资源、策略支撑。如果对协调推进问题重视不够，战略布局就无法形成，“四个全面”也会落空。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应重视研究风险与挑战评估问题，动力资源保护与开发问题，“全面”与“重点”的平衡问题，各项战略任务的优先次序安排问题，改革取向与法治取向、从严取向之间的协调问题，顶层推动与基层参与结合问题。

专家视点

运用战略思维 谋划全面深化改革

□ 李志昌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因素繁多、关系复杂、问题艰难、矛盾尖锐，必须运用战略思维进行科学分析和处理。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观察和处理问题，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局，用战略思维去观察当今时代，洞悉当代中国。运用战略思维分析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问题，应把握以下几点。

战略思维的全局性。全局性是战略思维的空间特征。战略思维考虑的问题主要是全局性问题，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局部问题。当然，全局中包含局部，没有局部就没有全局。战略思维不是忽视局部问题，而是在局部问题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洞察、把握全局的总体特征、总体趋势。全面深化改革是全局性的改革，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要对改革中的问题全面分析，在整体上进行统筹谋划，而不能只考虑某些方面的问题，忽视其他方面的问题，避免局部化改革、碎片化改革现象；在改革进程上，要协调推进，而不能只在某些方面推进，其他方面滞后或不推进；要把握改革整体动态，而不能只把握局部动态。

战略思维的长远性。长远性是战略思维的时间特征。战略思维在关注当前问题的基础上，考虑的主要是长远性问题。战略思维不仅要关注当前，更要面向未来。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往往不是在短期内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而且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不仅影响当前，更会影响未来。因此，战略思维是一种从长远打算的思维，不仅考虑当前，更要考虑未来。这就决定战略思维是一种预测性思维，要从现实情况出发，根据事物发展规律，对未来的变化趋势作出科学预测。在改革中，有些问题可以在短期内解决，但有些问题特别是涉及深层次利益关系、深层次体制机制的问题，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对这些问题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要从长远考虑，做出战略部署，逐渐加以解决。解决老问题会引起新问题，这是人们实践活动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采取一定措施解决当前问题，会取得一定成果，从表面看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又可能会引起一些当前看不到的问题，这些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才会显露出来。因此在解决当前问题时，既要预测好的效果，又要预测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后果，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以免在将来产生严重问题。改革不仅要看当前的现实情况，也要把握改革今后的走势，预先有所准备。

战略思维的综合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不是单一性的问题，而是由局部性问题综合构成的，就像森林是由树木构成一样。局部性问题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战略思维要求我们既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要避免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要把局部性问题联系起来综合考虑，把握整体局势。在改革中，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如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等不同领域的问题，可以相对独立地加以解决。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些问题不是绝对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改革措施之间也不是没有关系的。在解决各种问题时，要考虑到这些问题之间的关联性，要注意改革措施之间的协调性，避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

战略思维的层次性。全局和局部之间的划分是相对的，一定的全局是相对一定的局部而言，而局部中又包含局部，一定的局部相对它的内部构成来看，它又成为全局。战略问题具有层次性，战略思维也具有层次性，处在哪个层次上，就要考虑哪个层次的战略问题。改革是分层次的，从全国全社会的改革，到省级、市级、县级，直到基层的改革，分为不同的层次。就某个层次的改革来说，也是一个整体，包含各个方面的改革，也需要运用战略思维来考虑这个层次上的改革问题。一般认为，战略思维只是最高层领导才需要运用的，实际上各个层次的领导者都处于特定的全局上，都需要运用战略思维来考虑自己面临的问题。

战略思维的动态性。有些人认为，对战略问题一旦做出总体决策、总体部署，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照着去执行就行了。战略决策具有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由于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存在一些不可能完全掌控的不确定性因素，原来的决策在某些方面可能不适应，需要作一些调整。要注意战略思维不是静态思维，而是动态思维，要根据局势的变化，及时作出反应、调整决策。改革是一个动态过程，当前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特别是改革涉及一些深层次的利益问题，往往会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情况，因此，要以动态思维谋划改革，对改革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要有思想准备，当出现新情况时，要及时分析、及时作出应对决策。

发展与现代化

数据、大数据及其本质

□ 王克迪

最近几年，数据问题进入哲学视野。对于哲学家们探索的数据本质特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数据与大数据

技术进步，主要是计算机、网络和各种类型的传感器以及云技术、分布式计算与存储等海量存储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运算能力极速进步，使得数据概念被大数据概念取代。数据量增加速度之快，大致可以这样描述：最近两年生成的数据量，相当于此前一切时代人类所生产的数据量的总和。

大数据指的是所涉及的数据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人工，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截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人类所能解读的信息。大数据的特征，除了巨大、快速、多样多变之外，没有其他。因此，大数据本质上还是数据。

在大数据的上述特征中，其多样多变性值得特别关注。它表现为所生成数据格式的多样，如文字、图片、视频等各有多种不同的格式，取决于生成数据的技术与设备，却反映出数据生产的时代性以及数据处理的能力与条件，也反映出被描摹自然和社会的多姿多彩。另外，随着技术发展和数据量急剧增长，新的数据格式还会层出不穷，多变和多样特征更加突出。

大数据既是一个技术概念，又是一个商业概念，它的出现，有其特定背景，即IT领域的商业和渲染新技术的考量。大数据包揽了人类获取数据的所有途径，提示哲学研究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的先声，很久远之前就已经响起，那时，它仅仅被称作数据。在我们的讨论中，主要考虑数据与哲学的关联。

数据与认识

这里的认识，指的是人的认识，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大数据的出现和引起关注，使得一个事实得到确认，这就是，数据覆盖了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感官及其所获得的经验退居到显示屏之后，退居到各种类型的技术装置之后，这些装置将自然和外部世界的映像“转译”成人类感官可以接受的图像、声音甚至触觉和嗅觉味觉。这既是技术发展的必然，又是始料未及的情况。如果说，此前，哲学还试图在技术系统生成的数据之外寻找世界的直观映像，到了大数据时代，这种人类的直接感知即使没有被完全取代，也失去了其传统意义上的优势。一言以蔽之，哲学，需要从数据中寻求对世界的认识，舍此即失去认识的来源。

这似乎是一个惊人的变故，其实不然。在影响人类认识的议题上，大数据带来的变化，只是数量和范围上的，并非根本意义上的改变。事实上，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我们的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从来都是依赖于某些技术装置的，也就是说，人的认识，其实是通过数据获得的。

最早的技术装置，可能是直尺，它用于测量长度，例如田亩；更早的述说技术装备，也许是绳结，它用来述说一件重要的事件。在我国，从河北泥河湾先民打造石器，到安阳殷墟龟甲上刻画的文字，都可以看作是某种“数据”，表达着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某种认知。而面对着所有这些早期的承载数据的技术装备，人们获得对外部世界的某种最早的抽象认识。古代人先后发明过算筹、斗和称、漏刻、浑象仪、量角器等等，无不是用来产生认知外部世界的数据，人们也发明笔、纸张、雕版印刷术，也是用来记录和生产数据。依托所有这些，数据成为人们认识的依据，思考的源泉，表达的工具。

近代以来，西方的技术和科学异军突起，望远镜、显微镜、六分仪、光谱仪、质谱仪乃至加速器、射电望远镜相继出现，成为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有力工具。这些技术装备产生的数据成为近现代思想的新的依托。到了当代，伴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的出现，各种延伸和阔展人类感官感知能力的器皿设备层出不穷，终于完全或接近于完全取代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感知，通过把数据呈现给人类，成为人类认识的来源。这就是大数据的时代。

关键点在于，我们所知的世界，全部是数据表达的，其中一部分获得理解和解释，更多的只是数据，没有得到解释甚至没有得到关注，它只是像自在自然那样在那里，等待人们去搜索发现它，解释它，运用它。

数据与本体

根据上述认识，似乎可以通过观察数据的形成和生产，来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在解释客观自然议题上彼此消长。

在近代科学初兴时期，它并没有从传统哲学中分离出来，它被冠之以自然哲学。与之相并行不悖的，有哲学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后两者都是试图以某些观念描述和解释外部自然，寻求事物的本质，并在哲学领域合法存在。伽利略、牛顿等人推崇的使用先进观测和实验手段观察与调控自然，用数学述说自然过程。当这一切成为风气之后，哲学本体论逐渐衰退，哲学似乎放弃了对客观世界的描摹和解释，让位于自然科学。

最后一位试图运用科学数据来解释自然的哲学家是康德，他研习了牛顿的运动力学和天体力学，提出宇宙演化学说。然而，拉普拉斯在康德基础上，用物理理论和数学表述了星云说，在无限时空中的恒星和星系演化学说。拉普拉斯之后，科学之描摹自然优越于传统哲学得到公认。

一般认为，在经典科学时代，哲学与科学在描摹自然方面的差异，在于是否运用数据和使用数学方法。今天我们发现，这并非全部问题所在。经典时代，直至大数据崛起的今天，自然科学的确在使用各种技术装备获得的数据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哲学则固守传统的概念分析和一般推理方法，这还是指的好的哲学。这与其说是哲学落后于科学，勿宁说人类获得数据的能力尚有不逮，给传统哲学留有施展余地。

大数据的出现，包围了人类认



知世界的所有方面，情况发生变化。在科学界开始讨论并实施“计算一切”的时候，同时也给哲学重新回到讨论本体打开方便之门。这里发生的变化是，数据成为认知的源泉，思维的质料；我们对世界的解释转变为对数据的解读，舍此无他。大数据的出现，使得我们发现，我们所知的称作外部世界的东西，是通过数据来呈现的，当我们寻求世界的本质和意义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数据中徜徉；当我们觉得有所发现有所体悟时，实际上是自觉找到了一些数据之间的关联。

数据的物理学气质

所谓物理学气质，指的是思考事物的本质，从原理层面上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探究，揭示出事物的基本规律。当前备受热议的数据和大数据是否具有揭示事物基本规律的功能，可能还有待于观察，但是，数据，就其现象而言，似乎已经展示出某种物理学气质，考察这一特性，既有利于认识数据的本质，也有利于深化对物理学的认识。

这里所说的物理学，主要指的是量子力学。

众所周知，量子力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应用上都获得巨大成功，在场论、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学研究上都扮演者基础角色，在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以及超导物理等应用学科上都有极出色表现。量子力学与哲学的联系，比其他任何自然科学领域都要来得紧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论问题。

量子力学发现，建立在测不准关系基础上的认识，受到基本物理原理的限制，客观世界原则上不可能真正被观察到，我们只能根据物理测量结果认识世界。而测量本身形成对客观世界的干扰，导致无法真正认清它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唯一来源就是测量的结果，即所谓经验。

量子力学的这一认识原则引发将近一百年的讨论，至今未能平息。

尼尔斯·玻尔认为我们必须接受量子力学给出的认识原则，承认和接受自然作出的安排，量子力学已经很好地描绘了自然；爱因斯坦则不愿接受玻尔的“绥靖哲学”，他觉得一定是量子力学本身的不完备造成，人对自然的认识应该是能够穷尽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像量子力学所描绘的那样。

当我们回顾前述数据与大数据的认识论与本体论含义时，就明白，一直以来有关量子力学问题的争论，本质上就是对于数据的意义的争论。显然，爱因斯坦不愿意接受数据给出的结果，以及对于数据的解释，而玻尔则认为数据揭示的自然正是自然本体，无论我们是不是喜欢它。

有趣的是，人们一直在争论量子力学的测量问题，此前却几乎从来没有人意识到测量的结果本身就是数据，而数据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认识来源。离开数据，我们对于世界一无所知。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当我们认识到，数据正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源泉，所谓世界其实就是数据构成的，我们也会看到数据本身所具有的物理学气质，正像量子力学所强调的那样，世界隐藏在经验表象背后，我们所能谈论的，只是经验本身。